

中国 20 世纪显要之年丛书

1935

险象环生

高红霞 著

学林出版社

中国 20 世纪显要之年丛书

主编 张宪文

1935

险象环生

高红霞 著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935:险象环生/高红霞著. —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4. 4

(中国 20 世纪显要之年丛书)

ISBN 7 - 80668 - 624 - X

I. 1. ... II. 高 ... III. 历史事件 - 中国 - 1935
IV. K263. 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7559 号

1935: 险象环生



作 者——高红霞

责任编辑——褚大为

封面设计——周剑峰

责任监制——应黎声

出 版——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学林出版社(上海钦州南路 81 号 3 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钦州南路 81 号 1 楼)

电话:64515012 传真:64844088

印 刷——上海展望印刷厂

开 本——787 × 960 1/16

印 张——13.75

字 数——22 万

版 次——2004 年 4 月第 1 版

2004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8000 册

书 号——ISBN 7 - 80668 - 624 - X/K · 31

定 价——22.00 元

总序

张宪文

二十世纪是中国历史上大变动、大发展的时代，它经历了激烈的政治动荡和天翻地覆的社会变化。中国人民的觉醒及其取得的伟大成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中国是古老的东方大国，有着光辉灿烂的历史文明。可是，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至清朝末年中国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前进的步伐。鸦片战争向中国人民敲起警钟，中国人民开始奋起直追。十九世纪后的一百多年间，中国人民奋斗的目标，就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现代化中国。为此，中国人民不断努力，前仆后继，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付出了无数牺牲代价，一步步推动着中国社会的进步。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中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和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是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一个重大历史转折。这时，皇帝被赶下台，封建专制统治结束。中华民国和南京临时政府的建立，勾画了一个现代民主共和国家的雏形，展现了中国未来发展的图景。

辛亥革命是一次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它推翻了清王朝统治，建立了民国，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毫无疑问是一次胜利的革命。但是，我们不能期望通过一次暴力革命解决中国改造和发展的所有问题。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仍然欺压中国，封建主义的遗留仍然大量存在，中国仍然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国共两党都以自己的政治模式探寻改造和发展中国的道路。国共合作和抗日战争的胜利，都曾为中国的发展带来希望 and 良好机遇，但都因为执政者的失误和国共两党难以调和的矛盾而丧失了。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失败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是二十世纪

中国的第二个重大历史转折。它完成了国共两党政权的转移,实现了中国的独立自主。中国人民在世界上扬眉吐气,并从此站起来了。这时,中国经济虽仍落后,但是经过建国初期的努力,已经建立起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旧社会的污泥浊水被荡涤,整个社会出现了朝气蓬勃、奋发向上、廉政清新的景象。

1949年后,由于我国领导者对现代社会的基本理论缺乏正确的理解,因而未能自觉地实行新的社会转型。经济上,照搬苏联计划经济的模式,制约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政治上,国家权力的过分集中和高度集中,影响了人民民主的高度发扬;对外关系上,在苏美冷战对立的形势下,坚持站在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直接影响了对西方国家的开放和对世界的全面了解,也影响着中国本身的发展和进步。新中国建立后的十七年,中国又一次走了一条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在世界各国突飞猛进的局面下,中国又落在人家后面。

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使中国人民清醒。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三个重大历史转折点。在邓小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指引下,中国主动实行改革开放,自觉融入世界发展潮流。孙中山曾经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1978年的转折,是我国在总结深刻的历史教训基础上的一次理性的、主导性的社会转型。它开始把一个不完全的、具有初步现代化的国家,引向更高的现代国家的发展道路。

很显然,1912年、1949年、1978年,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无可取代的三次重大的转折点,它具有里程碑式的重要意义。然而,二十世纪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大事件迭出不穷。1927、1935、1937、1945等年代,也给中国的历史发展留下深刻的印记。学林出版社组织出版一套《中国20世纪显要之年丛书》,对二十世纪这些关键年代逐一作出分析介绍,是有重要学术价值和深刻实践意义的。它帮助人们进一步掌握历史发展的脉搏,深刻理解历史的进程和曲折,有利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事业。

丛书作者是一批学有专长、有学术造诣的中年历史学者。他们以其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深刻观察,把二十世纪众多关键年代的重大事件一一展现在人们面前,使人们从这些错综复杂的历史现象中,吸取经验,指导未来。作者们也试图在保持历史真实面貌基础上,把丛书写得更加活泼、生动,这对史学界来说,无疑是值得大力提倡的。我们欢迎广大读者和历史学工作者对这一尝试提出改进意见。我们衷心祝愿丛书成功。

2004年元月

于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

序

历史变迁的深层因素虽然需要在一个长时段中进行考察，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也可以截取其中一小段进行近距离审视。在布罗代尔的范式中，“个别时间”中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个别政治人物及他们演绎的政治事件，同样是历史结构中不可或缺的层次。可以显露历史发展态势的某些信息。这可能就是我选择 1935 年，并想通过描述 1935 年来展示民国历史某一侧面的初衷。

对 20 世纪的中国来说，许多年代因为重大事件的发生而显得极其重要。例如 1912 年中华民国成立，1945 年抗日战争胜利，1948 年国民党政治经济的全面崩溃、人民解放军三大战役决战的胜利，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等等，这些年代都对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而 1935 年并不是一个显赫的年代，即使在不算长久的民国历史时段中也是如此。它决没有 1912 年那样决绝的转折；也没有 1948 年的震天动地；更不及 1949 年的扬眉吐气。1935 年是纷乱的，多头绪的，它以另一种的面貌凸现着它的不可忽略。这年的中国站在了历史长河中的又一个谷底，它已积蓄了一些力量，准备着跃起，但这个跃起还没有开始就已化为泡影。这年的中国也好似行至一个十字路口，前方显示着多种可能，使人捉摸不定，光明无疑在前面的不远处，但此刻却是危机四伏，许多的必然和偶然，使一切都处在险象环生的动荡中。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希望在学术性与通俗性之间，寻找一种历史的叙事方式，使历史书籍和对历史的追问，被更多人所喜闻乐道。由于本书是在攻读博士学位、紧张地准备博士论文之余断断续续所为，深感没有利用更多时间和脑力来谋篇布局、斟字酌句，也没能用更犀利的笔调解剖历史变迁的深层因素，只算是用比较平实通俗的文字尽可能地显现中国历史曾有过的这样

一个年代，疏漏浅显在所难免，恳请读者赐正。

非常感谢学林出版社褚大为先生最终帮助我将这本书刊出，同样也感谢曾经为这本书出谋划策的完颜绍元先生。

作者

2003年11月

目 录

I 扑朔迷离的和平统一

1

国民党设计了一个“和平统一”年，西南实力派各怀心思，胡汉民与南京若即若离。蒋介石用新生活运动应对土地革命，雷声大而雨点小，背景是察东响起枪炮声，日本玩弄“亲善”把戏，“水鸟”外交敌不过军部强硬侵华政策。国民党以夷制夷不成便只能与虎谋皮，结果是既无统一，也未见和平。

II 日本导演华北事变

28

日本决计让华北也变成另一个东北。《何梅协定》使河北变成日本俎上肉，何应钦不愿承担罪责自有奥妙。《秦土协定》让秦德纯吐血，华北门户訇然敞开。日本策动“华北自治”运动，白坚武、武宜亭制造亲日暴乱。宋哲元夹缝中求生存，凭借冀察政务委员会，与蒋、日达成暂时妥协。殷汝耕领衔冀东傀儡政权。

III 中枢无力制止伪蒙闹独立

51

德王以成吉思汗第30世孙自居，号称匡复祖业，竟成他人囊中之物；日本垂涎内蒙，关东军操纵下建立伪蒙政权。国民党中枢鞭长莫及，暂且咽下苦果。

IV 西南大角逐

58

蒋介石在华北忍气吞声，多半为了在川、湘、滇、粤、桂间的那场与红军的生死大角逐。红军随机应变，改变行军路线，薛岳率中央军跟着走了一次长征路。各地方实力派为了保存自己各显神通，无所不用其极，既想方设法对付红军，又处心积虑提防中央军。

V 蒋介石有得有失

75

遵义会议后的红军，仍然走了一段艰难的“之”字路，调动敌军，实现北渡长江的计划。薛岳身负蒋介石双重使命，紧追红军，疲于奔命，却功亏一篑，但乘机收拾了王家烈，笼络了龙云，牵制了刘湘。参谋团入川，中央势力得以渗入西南，地方势力抵挡不住中央化举措。

VI 红军南下北上之争

93

会理会议平息了红一方面军高层的分歧，彭德怀与林彪一起挨了批。刘伯承与小叶丹彝海结盟，走出了当年石达开兵败迷径。一、四方面军刚刚饮罢会师酒，北上还是南下起风波。党中央率红军毅然北上。张国焘另立中央，不敌刘湘主力，8万兵只剩4万余。

VII 惨重的代价

110

对共产党而言，血雨腥风又一年。主力红军东冲西突之际，红二十五军孤军辗转抵达陕北。红十军团却没有这么幸运，怀玉山全军被围，方志敏被捕不屈而死。留守根据地的共产党重要人物为革命事业捐躯：谢子长伤病而亡；毛泽覃、何叔衡英勇战死；瞿秋白面对利诱，从容高歌赴刑场。刘伯坚低吟带镣长街行，志气轩昂，慷慨就义。

VIII 陕北大会师

125

毛泽东从报上发现了徐海东会师陕北刘志丹，决定将落脚点放在陕甘宁。中央红军在吴起镇打了个漂亮的伏击战，将西北马家军挡在了根据地之外。任弼时边行军边做思想工作，二、四方面军历经千难万险到达陕甘宁。三军协同在山城堡痛击胡宗南，促进了“逼蒋抗日”方针的实施。

IX 币制改革艰难启动

134

美国实施白银政策，世界银价上升，中国白银外流，原本脆弱的金融体系风雨飘摇。国民政府寻求大国支持，决定改革币制。英、美、日各有各的打算，都想得些好处。法币终于同美元挂钩。日本人武装走私有恃无恐。国民政府逐渐掌控四行二局，金融垄断大功告成。

X “一二·九”运动

156

华北沦亡迫在眉睫，北平学生已经无法安坐于书桌旁，走在爱国学生运动前列的是燕京、清华和东北大学。全国各大城市的学生犹如一堆堆被点燃的干柴，而国民党地方当局都成了消防队。学生成立“民先队”，抗日救亡运动高潮在各地掀起。

XI 蒋汪貌合神离

185

这是蒋、汪合作的重要一年，他们表面密切合作，实际上同床异梦。“四中全会”响起暗杀枪声，汪精卫身中三弹暂离政坛，国民党内的政治格局发生变化，时局的转折也悄悄地加快脚步。

XII 国内和平的一线曙光

195

无论用什么借口，对日妥协的政策已备受责难，蒋介石不得不公开表示，“至非牺牲不可时，自必决然牺牲”。国内外形

势的发展变化，使蒋介石意识到，武力“剿共”不得人心，也不可能成功。国共间开始多层面的接触。国民党抗战准备也悄然启动。

结束语

208

后 记

郭太风 210

I 扑朔迷离的和平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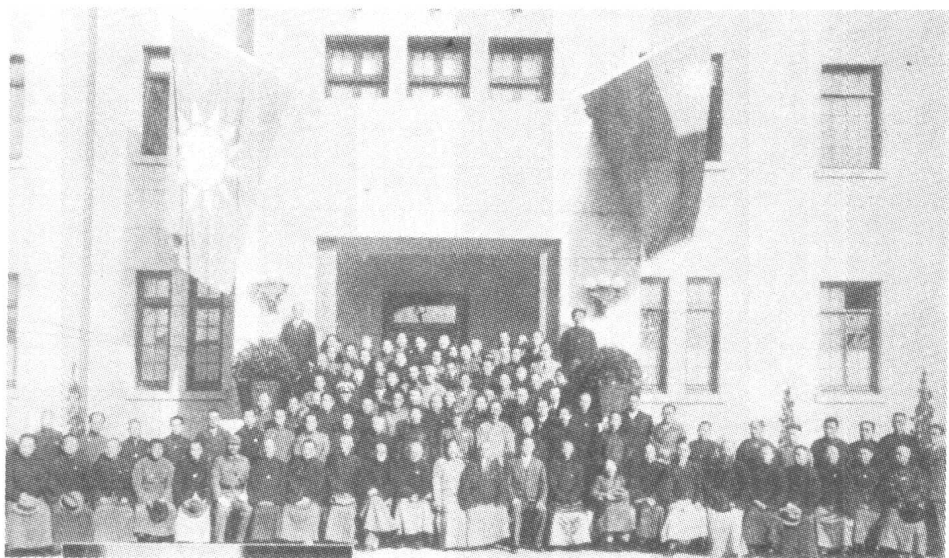
1935年,民国24年,农历己亥年,以动荡不宁、危机四伏,成为历史长链中重要一环。

这一年,距辛亥革命24年,距新文化运动20年,距北伐战争9年。出生在19世纪末的一代人物,即本书将要出现的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等正当壮年;而在民国成立前后诞生的一代,正是血气旺盛的青年。无论就人才或时机,这都是一个应该起飞的时代,然历史有时并不循着正常的逻辑轨迹发展。

1935年元旦,一个普通的节日,尽管缺少了些新年的气氛(这大多缘于中国人对公历新年的漠视),但相对来说,仍是难得的平静、祥和。“中日友善”的信息频频见之于报章,使人们对丧失东三省的创痛多少有些麻木,“一·二八”的枪炮声也早已沉寂。正在西南起伏的国共厮杀声,对于生活在东南地区的中国人,毕竟遥远、隔膜了些。不过,在一片祥和的表象中也游荡着些许紧张。长江水位终日不落反涨,1月22日已达9.3尺,虽是下游淤塞所致,仍为历史上所少见,似乎传导着一种不安。《申报》一则预言式的新年贺辞颇为意味深长:“据说1936年是一个紧张的年头,那么做它的贴邻的1935年也许不是一个平凡的年头吧,在这未来的年头面前存在着一种东西,生存与死亡,欢乐与悲惨……”这话今天看来,竟像谶言般灵验。

1. 难解的“西南”之结

跨进1935年的门槛,人们一边从报章上搜寻着国民党军“剿匪”的信息,一边为北面陀陀而来的日本人的脚步忐忑不安。



1934年12月10日，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在南京中央会议厅举行，
讨论宪法草案，此为五中全会全体委员合影

出乎意料，新年的最初一个月，民国上空弥漫着更多的是和平统一的祥云。这恐怕是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中国以来和平统一空气最浓厚的一段时间。毫无疑问，刚刚结束的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中委们济济一堂，通过了一系列颇为务实的议案。连从未出过四川的刘湘居然也到了南京，说是要开诚布公地讨论四川的财政、军事和政治改组问题。这为形成年初“和平统一”的温馨局面打下了底色。1月1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庆祝中华民国成立24周年纪念会上致辞，强调国内需要的是“和平统一”，并称：欲达此目的，“中央政府与各省关系，除了实行总理的均权制度主张，没有第二条路”。接着，蒋介石公开表示：要“消除隔阂”、“分工合作”，“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不取决于武力”。国民党的中枢要员如王宠惠、孙科等，不辞辛劳奔走南北，折冲樽俎。这一切确实给人带来些许“和平统一”的希望。

此时蒋介石、汪精卫不厌其烦强调的“国内问题取决于政治不取决于武力”、“和平统一”等，并不是针对共产党的。报刊上频频刊登国民党军“剿匪”战事取得重大进展，连江西共产党的“老巢”都收复了，共产党的问题已不是燃眉之急。那么国民党要员们孜孜以求的“和平统一”究竟指的是什么呢？

是政治解决“西南”问题。

在民国史上，西南派中的“西南”不是地理名词，而是政治名词，专指广东、广西地方实力集团。他们中又可分为：以胡汉民为首的元老派，包括萧佛成、邓



1934年12月3日，孙科（前排右一）、王宠惠（前排右三）在胡汉民（前排右二）公馆前留影。

泽如、邹鲁、唐绍仪等，属于国民党中的政治派别；以陈济棠为首的粤系，包括余汉谋、陈维周、李汉魂、林翼中、区芳浦等，是广东军阀为主的地方实力派；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李任仁为首的新桂系，是以广西军阀为主的地方实力派。在民国不算漫长的历史中，他们之间在地域、历史渊源乃至团体利益上，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往往采取一致行动。另一方面，他们之间也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政治抱负和集团利益不尽相同。他们共同的政治靠山是胡汉民，实力后盾则是粤、桂系军事集团。

西南与南京对抗，胡汉民是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胡汉民，原名衍鸿，字展堂。1879年12月出生于广东番禺县（今广州），比孙中山小13岁。他的父亲做过广东几处州县官的幕僚，这给了他从小熟读经史书籍的便利。他19岁便任广州《岭南报》记者，同情保皇派。同那个年代青年都企盼学而优则仕一样，他21岁参加乡试，中了举人，不久，两次东渡日本，先后入东京弘文学院师范科、东京法政大学速成法政科就读。1905年秋，同盟会成立，他与后来成为孙中山另一得力助手的廖仲凯一同加入，并成为该组织的活跃成员。他担任过同盟会评议部议员、书记部书记、《民报》编辑等职，在与保皇派的《新民丛刊》论战中起过一定作用。以后，他又追随孙中山至新加坡、河

内设立革命机关，并参与黄冈、镇南关起义，成为孙中山革命团体的骨干之一。辛亥革命爆发后，他曾任广东都督、南京临时政府总统府秘书长。由于具有这样一段光荣历史，胡汉民不仅在国民党元老中很有分量，而且在广东籍国民党将领中也享有威望。

1925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胡汉民出任外交部长。因受廖仲凯被刺案牵连，他一度被扣，释放后去了苏联，次年回国，支持蒋介石发动反共政变，提出《训政大纲》、《国民政府组织法》，为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立下汗马功劳。在南京政府中，他出任立法院院长，与蒋介石合作了四年。1931年，蒋介石在摆平了军事实力派后，鉴于各反蒋派曾以“制定约法，反对独裁”相号召，提出立即召集国民会议，制定约法，力图以此争取人心，使反对派失去借口，从而稳固自己的统治。然而，遭到了胡汉民的抵制。胡汉民认为，这样做有违孙中山遗教，并在《中央日报》记者访谈时，公开了他的反对意见。蒋介石本来就对胡汉民总以立法院牵制行政院的做法心生恨意，见胡一味固执己见，便动用了他的强项：凭借军事实力，迫使胡汉民就范。

1931年5月28日，胡汉民接到蒋介石的一张晚宴请帖，他在忙碌了一天后，毫无防备地如期赴约，不料，等待他的是与蒋决裂前的最后一次激烈争吵。同以往一样，彼此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胡汉民被迫按照蒋的意思写了一封辞职报告，说“身体衰弱，所有党部政府职务，概行辞去”。后来在报刊上发表时还加上了“况国民会议开会在即，尤不胜繁剧”等。这是吴稚晖等人另添上去的，胡汉民对此从未承认。第二天，十余名军警将胡汉民押到南京汤山软禁起来，从此蒋、胡结束了从1927年开始的政坛携手的历史。在以后纷扰的岁月中，双方更多的是口诛笔伐。就国民党而言，从此一党专政进一步发展为个人独裁，国民党元老们“咸袖手结舌，莫取一言”，南京国民政府仅存的一点民主气氛一扫而空。

在不同历史阶段，经常在胡汉民周围为之奔走的有古应芬、萧佛成、邓泽如、邹鲁等一干国民党元老级人员。1934年2月，蒋、汪曾联名发表“真电”，大意是申明国家需有统一机构，提出了中央与地方统一的办法，中央得常派要员视察，而地方要不时到中央述职。“真电”在两广集团内部掀起了不小的波澜。胡汉民在香港邀邹鲁、萧佛成等合计，以元老派为基础，吸收与南京中央对立的知识分子，建立胡汉民为领袖的反对党——中华革命党。他们反对南京政府裁撤西南政委会及西南执行部，提出如中央决意要裁撤这两个机关，就必须恢复广州政治分会，想以此保住自主地位。萧佛成还进一步提议，广州政治分会采取委员长制，由胡汉民出任委员长，并请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加入。胡

汉民、邹鲁、李济深还主张西南五省联合起来,形成五省联盟,以对抗南京。

西南派的军事后盾是新桂系与粤系。

桂系是西南派系中的重要角色。桂系有新旧之分,这里所说的桂系是指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1930年前为黄绍竑)为首的新桂系。他们是在驱除了以陆荣廷、沈鸿英为首的旧桂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广西地方实力派。李、黄(绍竑)统一广西后,宣布服从广东国民政府,广西成为最早宣布隶属于广东国民政府麾下的一个省份。新桂系的军队在1926年参加北伐,战功卓著,1927年协助蒋介石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此后,蒋、桂矛盾逐渐激化,1929年起,新桂系加入国民党内军事反蒋的行列,先后参加了蒋桂战争、护党救国运动,直到中原大战,无一次获胜。一蹶不振后便埋头广西,励精图治,很长一段时间里借助两广同盟,与南京国民政府和平对峙。



李宗仁(右)与白崇禧

粤系是指以陈济棠为首的广东地方实力派。1929年,蒋、桂相争时,蒋介石为拆散两广同盟,软禁了当时广东的军政领袖李济深。李济深部下陈济棠,在胡汉民、古应芬支持下趁机取代李济深,掌握广东军政大权。因有这一层关系,在政治上,陈济棠一度唯胡汉民、古应芬意志是从。

西南派系中的任何势力,都与蒋介石有着漫长、曲折的争斗历史。1931年5月胡汉民汤山被囚事件发生后,以西南军事集团为支柱,国民党内众多重要政治派别云集西南,包括胡汉民派、孙科派、汪精卫派等,在广州召开反蒋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并另立国民政府,摆开西南反蒋大阵势。这是继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反蒋失败后的又一次更大反蒋联盟,双方口诛笔伐,剑拔弩张,造成宁粤对峙局面。

眼看战火一触即发,不料“九·一八”事件发生,全国各界团结御侮呼声日高。迫于舆论,宁粤双方不得不由武力对峙转为分权谈判,条件之一是蒋介石下野,于是蒋介石经历了1927年以来的第二次下野,宣布辞去国民政府本兼各职,不过仍保留着国民党内最高领导人的职务。国民党中常会决定由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先是陈铭枢代理,旋又换成孙科。胡汉民曾这样评

价过孙科：因为他是中山先生之子，所以有革命脾气；国为他在国外长大，所以有洋人脾气；因为他是独子，所以有大少爷脾气。他有时只发一种脾气，有时两种一起发，有时三种一起发。胡汉民原想通过孙科左右政局，不料几十天之内孙科便陷入财政与外交进退维谷的境地。蒋介石与汪精卫携手，得以在“共纾国难”的旗号下官复原职，胡汉民被抛在一边。此时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广州国民政府已被取消，他虽仍为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最高领导的身份。此后一直到1936年“两广事变”发生，西南派一直以此两机构为门面，粤桂军队为支柱，胡汉民为精神领袖，与南京中央保持着不战不和状态，尽管如此，却也具备着另立中央的便利条件，对南京威胁很大。在此期间，胡汉民不仅以《三民主义月刊》为舆论阵地，明里谴责，暗中则不断策动西北、西南、华北等地方实力派实施军事倒蒋，但由于各地方实力派各有所图，最终仍将一介文人的胡汉民撇在了一边。“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采取军事镇压的方式，致使两广方面对南京戒心增大，他们表面与中央保持合作，暗中则作各种应变准备。蒋光鼐、蔡廷锴在福建反蒋失败后，到香港筹备成立反蒋组织，创办《大众日报》，召集漂流在各地人马。陈济棠示意蒋、蔡不要在粤活动，并禁止广东报纸登载此类消息，以防蒋介石发难。当蒋、蔡受特务追捕时，他慷慨解囊，送旅费十万元，请他们出洋。桂系则埋头于广西民团建设，充实力量，并支持原十九路军将领翁照垣在龙州招集旧部，引为羽翼。

1935年初，各种因素促使南京与“西南”渐生和解之意。就蒋介石南京政府而言，日本由东北进而占据长城一线，并对华北实行政治、经济与军事渗透，中日再度冲突在所难免。在用武力将共产党的主力驱逐出江西、福建等区域后，蒋介石希望用政治方式解决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尤其是号召力尚存的胡汉民，他周围还聚集着一批老国民党员和地方实力派。而胡汉民在一次次的军事倒蒋都未如愿后，眼见日本威胁加剧，也萌生了政治解决之意。这就有了两者接近的基础。

南京中央对西南的和平攻势从1934年便不紧不慢地展开了，先是以召开五全大会为号召，但遭到西南方面的强烈反对，蒋介石只得宣布延期。年底，蒋介石争取西南反对势力更有紧锣密鼓之象。11月，蒋、汪联名通电公布了一项中央与地方“均权”的方案；法制方面，中央规定政治原则，地方制定实施办法；用人方面，地方可选择保荐，由中央任命等。以此作为对胡汉民“均权”呼声的应和。12月1日，孙科、王宠惠、傅秉常等衔蒋介石、汪精卫之命由沪起程赴港，准备会晤胡汉民及西南中委，商谈召开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事宜。他们带去蒋